

【文化谐音】

□傅国满

大时代的同学不同路

在大起大落、风云不定的大时代里，他与周恩来、罗隆基三人最终走的都是从政之路，三条道路却截然不同，各自的命运遭遇也不一样。

“五四”前后，吴国桢在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张道藩等同学，在清华学校与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等同学，在大起大落、风云不定的大时代里，他与周恩来、罗隆基三人最终走的都是从政之路，三条道路却截然不同，各自的命运遭遇也不一样。

吴国桢少年得志，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获博士学位归国之后，因缘际会，受到新崛起的强人蒋介石欣赏，年纪轻轻就当上汉口市市长，然后一路攀升，从抗战时期作为陪都的重庆市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代理部长)，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仕途可谓一帆风顺。日本投降之后，他出任上海市市长。国民党丢掉大陆，蒋介石要这位受美国青睐的留美博士来做“台湾省主席”，“这简直等于是托孤寄命”，他也由此达到一生仕途的巅峰，最终却与蒋介石闹翻，出走美国，酿成轰动一时的“吴国桢案”。初到美国的沉闷日子里，他回首半生，完成了一本英文回忆录书稿，没想到微缩胶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里一躺就是大半个世纪，直到2009年才在香港出版中文译本《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吴修垣译，马军校订、注释，中文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家左舜生目睹过吴国桢当年的春风得意，在重庆林园，一次欢迎美国华莱士副总统的宴会上，吴国桢任宾主两方的翻译。左舜生的座次刚



吴国桢夫妇

好在吴太太黄卓群的正对面，他看着吴、看着黄，觉得他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佳偶，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用钢笔写下吴梅村《圆圆曲》中的两句诗：“白哲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交给邻座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要了他的笔，顺手在上面批了“恶作剧”三个字交还他，然后两人相视一笑。写《圆圆曲》的诗人姓吴，诗中咏叹的对象也姓吴(吴三桂)，他因此想到以这两句诗来开吴国桢的玩笑。在他眼里，那时的吴国桢“既能善事长官，又拥着一个如花美眷，于公私交往，可以说路路可通”，仕途的前程一片大好。但对于这样的平步青云，他是不以为然的。

等到1955年12月17日，在权力舞台上黯然跌下的吴国桢已

过了知天命之年，不再是那个“白哲通侯最少年”，他在《夜来临》的最后说：“但对我来说，黑夜早已来临……但是在这沉沉黑暗之中，我似乎看见了能将我引向安全的灵光。既然黑夜已如此之长，那么黎明还会远吗？”那一刻，他的南开老同学周恩来正身居总理高位，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日理万机、日夜操劳。他的清华老同学罗隆基身为最大的民主党派盟中央副主席之一，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上登上了主席台，不久前还曾衣锦还乡，回到故乡江西安福的那个村子。而他又被迫离开大陆，又被迫离开了台湾。对于这几个政治上不同路的老同学，他的心情无疑是复杂的，也许唤起了属于他的那些好时光的记忆，如同

打翻的五味瓶。

周恩来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男扮女装，“周恩来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1962年，他在美国出版过一部以周恩来和他为原型的英文小说。

他笔下的罗隆基是个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者”，“贪求荣誉，爱出风头”。“(罗隆基)具有鼓动者的天才，能令群情激愤，而且文笔犀利，差不多能颠倒黑白。在那时，有不少人把他当做勇敢的英雄来崇拜。除非有坚定的信念和很强的原则性，否则是很容易屈从于这种诱惑的，可怜的罗隆基恰好就是许多的不幸者之一……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他们！”显然，他对老同学的政治选择十分不满，但如果从罗隆基的立场看，吴国桢不过是个政治上的失败者，被赶到台湾去的“战犯”，恐怕也是愚不可及。只有一点，他预言也许可怕的命运正等待着罗隆基，不到两年就被事实所验证，罗成了右派，命运从此逆转，1965年在凄凉中去世。周恩来于1976年去世。吴国桢晚年在美国定居讲学，到1984年6月才离世，本来他已答应邓颖超回大陆访问，还要参加“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但最终未能成行。

(本文作者为近代史研究学者，著有《追寻失去的传统》等书)

前几天读了房龙的《宽容》，我感慨万千。人类历史上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千千万万的人竟然生活在如此精神压抑、禁锢和残忍的迫害之下，令我震惊。房龙不愧为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他把被岁月尘封的很多真相揭露出来，让现代的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

【沉思默想】

宽容

□王佐良

人们常常以为，宗教是人的精神寄托，宗教是慈善、宽容、友爱的代名词。可是，看了《宽容》，才知道事实原来如此。我不知道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宗教的教条和戒律约束人的行为的，那些制定戒律的人以及实施这些戒律的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来这样做？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有没有设想过？史书上对此没有相应的记载。但是，一个社会因此而进步，还是倒退，或者停滞不前，却与这些戒律的制定和实施有密切的关系。古埃及，这个曾经实施严酷的戒律的国家，在几千年里一直停滞不前，就是证明。它的人民为此忍受的苦难，史书上的记载寥寥无几，但是从宏观上，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已经一目了然。

还有欧洲。我总是在思考，中世纪在基督教教会近乎疯狂和残忍的压迫下，欧洲如何能在近代以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发达和富裕的地区？因为，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从中分裂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教派)对人的压制已经到了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步！在中世纪，大多数欧洲人不能阅读用拉丁文写的《圣经》，只能听神父或牧师布道，他们在自己的“信仰”方面是愚昧无知的。那么，能阅读拉丁文的文人又如何呢？小心，他会因为抄错一个标点而丢掉性命！谁要是在抄写《启示录》时，把一个句号错写成逗号，那么，他的脑袋就会被吹下来……两个旅行的青年仅仅因为身上带着一本《哲学词典》，竟被“宽容”地砍掉脑袋！更不用说对所谓的“异教徒”、对所谓的“女巫”的迫害了，那些让人匪夷所思的酷刑，只有最凶残和最恶毒的魔鬼才能想得出来。今天风光旖旎、游人如织的日内瓦，在加尔文教派统治时期，是一座虐杀“异端”分子的鬼城。即使在大西洋彼岸的美洲，那一片新生的土地，因为移民各不相容的信仰和教派背景，“宽容”也曾经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奢望。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笛卡尔不在自己的祖国写作，要跑到荷兰去，并且不停地从一个村庄转移到另一个村庄，迁移不定。当时的荷兰还算是一个“思想上”比较“宽容”的国家，即使这样，他写的东西，哪怕几页纸，也要给当地的宗教团体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过目审查。我也才明白，为什么斯宾诺莎会被革出教门，靠磨镜片为生，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马丁·路德的贡献不可磨灭，因为他用德语翻译了《圣经》，使普通的德国人可以阅读它，可以自己判断上帝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耶稣到底说了些什么……至此，他们才开始成为“人”，而在此之前，无论他们是贫穷还是富有、高贵还是低贱，他们在精神上完全被人奴役！然而宗教改革并没有消灭酷刑和迫害以及对不同教派教徒的屠杀，如果说天主教对清教徒的迫害令人战栗，那么，读一读清教徒的教规，也同样令人胆战心惊……直到法国大革命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直到拿破仑横扫欧洲，加速了欧洲封建政治的瓦解和政教分离。

历史终于进入了现代，社会“宽容”到房龙可以写出这本名为《宽容》的书，并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让世界上很多人阅读了。现在看来，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是大智慧下的大宽容。两千多年前孔子以“忠恕”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道，应该是在深入透彻地考察和分析社会的本质之后作出的极有远见的判断。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翻译家)

【个人记忆之三】

□吕家乡

走出教养所

身边的例子让我看到了曙光。此后每过一段时间就开一次改恶从善大会，每一次都更加激起我强烈的向往。

1959年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庆，为了庆祝新中国的成就，1959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报道。两三个月后，教养所也召开了“改恶从善大会”，宣布解除了几十个人的劳动教养处分，其中就有一个和我在同一小队的小伙子，他原来是小学教师，右派，处分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这次得到了“双解放”，不仅解除教养，也摘去右派帽子。身边的例子让我看到了曙光。此后每过一段时间就开一次改恶从善大会，每一次都更加激起我强烈的向往。

1959年秋，我被大队调去参加开矿技术培训班，学了半个月，回来就参加了大队“矿山技术组”，成了四个“技术员”中的一个。主要职责是发党开矿中的隐患，排除险情，提示注意安全。整天在矿山上转悠，劳动强度比原来减轻了，活动范围和自由度也比原来大了，而且经常受到领导的表扬。这期间，我认识了两个曾有几十年党龄、官居厅局级干部的右派“同学”，虽然很少交谈(教养所规定不准彼此交谈案情)，但从他们的不温不火、沉稳坚韧中受到了感召和启发。半年后，我又被调到“王村八三厂技术研究室”的“酸处理”车间，做了小组长。这里实行三班倒，每天劳动只有八个小时，粮食定量降为每月32斤。大约从1960年冬天起，管教人员就不断地让我写进入教养所以来“改恶从善”的总结材料，态度也明显地亲切了。许多迹象让我觉得“快

要解决问题了”。但是，一次次的改恶从善大会都没有我的名字。直到1961年11月，终于得到了“双解放”的通知。有的人只是解除教养却没有摘去右派帽子，我比他们更值得高兴。看了解除教养的通知书，有一栏是“处分原因”，有的人是“攻击合作化”，“攻击肃反”或“反对党支部”，我的竟是“反对共产党”，太严重了！高兴的心情骤然降低。

第二天早晨，我就搭上了奔赴济南的火车。回到离别三年半的山东医学院大院，我习惯性地先去党委报到，党委却让我去保卫科。太意外了！我知道保卫科是专门对付破坏分子的，难道以后我仍然被当做破坏分子吗？难道我即使“改好了”也还不是人民的一贯吗？保卫科科长态度倒不错，说：你的情况我们早就知道了，也跟高中部联系好了，你还回高中部工作。我向高中部的新校长报到，领到了“山东医学院高中部”的校徽，珍贵地别到衣襟最显眼处，唯恐别人不知道我已经不是被教养人员，而是真实的，并非假冒的教师了。很多老同事还在，大都对我很热情，像久别重逢一样。那时正在严重困难时期，几乎人人浮肿，粮票、油票、肉票都很稀缺，有的送我食堂的馒头票、菜票，有的把难得买到的带鱼和我分享。有的老同学听说我“回来了”，也主动来看我，带给我作为补品的黄豆。

高中部正好有个语文老师请假，我只准备了两天的稿子，就站到了离别数年的讲台上，回家探亲的打算只好推迟。第一次讲课时，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

长都来听课，加以考察。课后评议较好，认为虽然搁置数年，仍然不显得生疏。接着评定我的工资等级，我以为会恢复原工资75元，却只定为59元，属于大学毕业生开始定级的级别(这工资级别一直保持到1979年1月，“改正”后才恢复到75元)。这让我感到意外。不过，比起在教养所里我每月只有18元，现在强多了。学生对我这个半路接课的老师有点好奇，打听到我的政治身份，故意问我从哪里来的，有的则不知轻重地说：“右派老师都是有本事的！”政治气氛显然宽松多了。

在图书馆看到有的刊物发表了摘帽右派作家的作品，我也给《山东文学》写了一篇评论稿，很快刊出，编辑热情地来信向我约稿。我的老同学李国涛当时在太原编一个学术刊物，打听到我的地址，来信也约我写稿。我“归队”不过两个月，就接连写了三篇文章，都得发表。这让我的情绪受到鼓舞。这样宽松的政治局面持续到1962年夏，此后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发表文章前都要政审，我就不可能发稿了。

寒假里我回到沛县的家乡。到家已是黑天，侄儿给我做了一盆白面面条，我竟一口气都吃光了。饭后和家人共叙别情，才知道我吃掉了家里准备过春节的一半白面。全家老少早已处于忍饥挨饿状态，主食是发霉的地瓜干，每人每天不过半斤。油腥更谈不上，炒菜待客只能以几粒蓖麻子炆锅。舅舅所在的安徽萧县饿死人更多，逃难到我家，已住了两个多月，前天才被四姐接去。真想不到，我在教养

所的口粮比家里多得多了(最后在酸处理车间的粮食定量是32斤)。

第二天看望了几家邻居，都没有把我当做另类。一位贫农大婶毫无顾忌地说：“你可从劳改队出来了！右派都是敢说话的。谁叫你敢说话哩？以后嘴上要有个站岗的！”

外地工作和上学的侄儿们也陆续回来了，他们都因为我的连累，在入党、提级或升学上受到了影响。我真切地感到了我的跌倒给全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的连累，深感负疚。经过认真准备后，郑重地开了个以我为中心议题的家庭会。首先发言的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就是希望我快点找个对象，了却终身大事，就退席了。接着大家设身处地地对我“今后怎么做”提出了许多希望和建议，概括起来是：“埋头苦干，戴罪立功。”“只干活，不逞能(‘多干活，少逞能’都不行)。”“老实老实再老实，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再栽跟头。”对于我内心的委屈情绪和翻案想法，大哥表示理解，因为他是基层干部，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白旗”拔掉，受到批斗，不久前获得甄别平反，恢复名誉。在安徽工作的侄儿说：安徽一度曾经甄别平反了少数右派，后来中央下文件停止。大家对我的谆谆告诫是：这事要完全相信组织，千万不可自己跳出来贸然申诉，免得偷鸡不着蚀把米。

亲人们语重心长的嘱咐，我铭记在心，这些的确成了我今后做人的准则。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